读史札记

清末日本间谍成田安辉西藏潜行活动之考察

李丽　秦永章

19世纪末，日本军国主义者考虑到我国西藏的重要战略地位，采取各种手段加快了对西藏的渗透活动，派遣特务潜入西藏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之一。其中，成田安辉（1864—1915）是20世纪初（1901年）由日本政府外务省派往西藏的第一个间谍，也是继河口慧海后进入西藏首府拉萨的第二个日本人。由于其入藏活动是在相当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加之出于各种考虑，成田安辉没有立即发表他的入藏报告，因此其西藏潜行活动亦不被大家所知。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其《进藏日志》①的发表，尤其是日本外务省档案材料公开以后，逐渐被世人所了解。但至今国内尚无专文发表，因此本文以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资料《成田安辉西藏探险关系一件》②为主，再结合其他资料，拟就关于成田安辉的西藏潜行活动做一比较全面的考察，以期对人们加深了解日本渗透、侵略我国西藏的活动有所裨益。

一、成田安辉及其入藏动机

成田安辉，1864年1月生于东京，为鹿尔岛藩医成田安秩之长子。1877年从东京麻布的养正塾毕业后，入陆军士官学校（第1期）学习，后因病退学。1887年春，远渡美国学习。1892年，在旧金山成立“帝国植物商会”，从事植物进出口贸易。1894年，他承包了处于创业时期的美国太平洋联合铁道公司的铁路维护工程，成为有400余名日本劳工的资本家，收入颇丰。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成田安辉为了表示自己的“爱国热情”，捐献巨资给日本海军。中国由于在甲午战争中失败，1895年4月与日本签订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从此台湾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成田安辉听到日本在甲午战争中获胜的消息后，怀着开创一番新事业的勃勃野心，于1896年3月从美国返回日本。次年3月，他被派往台湾，担任台湾总督府民政局植产部技师，专门从事拓植业务。③

甲午战争以后，日本为了对中国进一步扩张以及对俄战略的需要，急需有关西藏方面的情报，深感对尚处于闭锁状态的西藏进行探险之重要。因此，1897年12月22日，日本外务省就制订了准备派遣成田安辉入藏的“西藏探险计划”。据外务省有关资料记载，当时的外务大臣大隈重信、军令部长桦山资纪（海军大将、曾任台湾总督兼军务司令官）、继任的外务大臣西德二郎等人是西藏探险计划

[收稿日期] 2004-12-30

[作者简介] 李丽（1959—），女，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081；秦永章（1963—），男，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081

的倡导者和参与者。因为，成田安辉富有“爱国热情”，并具有在国外生活和工作经验，于是他成为实施这一计划的理想人选。1898年初，日本外务省便密令成田潜入西藏，于是他辞去了在台湾总督府的工作，直赴中国四川重庆，等待时机潜入西藏。

关于成田安辉的入藏动机，在 1900年 10月 30日他给当时的外务大臣加藤高明的一封信中写得也相当清楚，信中云：“俄国与西藏的密切接触令人忧虑，如果现在我们不重视对藏策略，不知要发生什么样的祸患……因此，从政略上来讲，如果让俄国抢先的话，则对我国形成不利影响……要想阻止俄国南下，就得先让西藏开放。从现在的形势看，实现西藏开放并非难事。不抓住今天的机会，更待何时。”④成田安辉给加藤高明的另一封信中，更加赤裸裸地说：“日本人不光需要在亚洲大陆上自由活动，从事各种经营。现在的地球犹如一个大的围棋盘，各国列强都在这一个棋盘上下棋。在西藏这块空地上，应该由我们下，如果放弃将被白棋（指欧美国家）所占领。因此，为了日本国，我勇敢地答应了当初准备实施五年的西藏探险计划。”⑤

二、成田安辉的入藏准备及经费来源

外务省制订的西藏探险计划中，明确规定该计划将连续实施五年（从出发至归国），第一年让成田在重庆学习，此后再去西藏，其一切经费由外务省机密费中支出。给成田入藏经费的补助标准是依照外务省派遣的留学生的标准，根据当时日本驻重庆领事馆领事加藤义三提供的《上海重庆间旅行纪要》，外务大臣西德二郎（1897年 11月就任外相）下令先给成田发放了从东京到汉口的交通及补助费合计 709.6日元。

1898年 2月，成田安辉抵达重庆，在驻重庆领事加藤的协助下，先入重庆的东川书院学习汉语，兼作各种入藏准备。

成田安辉为了掩饰其真实的入藏目的，避免受到清朝和西藏地方政府官吏的怀疑，以及给自己寻找谒见达赖喇嘛的借口，他提出由日本东本愿寺法主大谷光莹给达赖喇嘛写一封亲笔信，将他介绍成是东本愿寺法主的使者或是日本西藏佛教研究会的派遣者。外务省收到报告后，迅速与东本愿寺交涉，让大谷光莹给达赖喇嘛写了一封亲笔书信，介绍成田安辉是入藏“求经”的僧人，还给他提供了一套僧装。

但是，成田认为光有本愿寺法主的介绍信还不行，他说还应置办一些给达赖喇嘛及其他要人的礼物。为此，1898年 11月 12日，成田写信给日本外相青木周藏，要求返回日本做购置礼物等准备。但其申请未予批准，青木外相下令：“不要回国，按照以前的计划入藏”。

成田安辉的归国申请被驳回以后，同年 12月 16日他又给加藤领事提交了一份礼品清单，要求用公费购置礼物，并要求在 1899年 5月以前运抵重庆。其礼品清单如下：欲赠达赖的礼物包括体裁合适的真宗经典《正信偈》一部、得体的袈裟一套、黄色布料一件、水晶念珠一串、日本地图一张；给驻藏大臣的礼物是一把造型漂亮的日本刀；给达赖侍从堪布的礼物是日本刀一把、面料一匹、水晶念珠两条（其中一条准备给打箭炉的喇嘛）。⑥ 12月 24日，成田安辉又追加了以下礼品：一、体裁良好的照片若干张，其中应有日本皇居、日光（为日本著名风景地——笔者）及其它风景名胜、阅兵式、演习、军舰及大型工厂等。二、东本愿寺法主大谷光莹的照片两张（其中一张为自己所求）。⑦外务省虽然拒绝了成田安辉归国置办礼物的请求，但最大程度地满足了对达赖喇嘛等人准备赠送礼物的要求，除因买不到阅兵式、演习、军舰及大型工厂的照片而未能提供外，其它礼品从日本迅速送至重庆。

相关资料表明，成田安辉的入藏经费除由外务省提供外，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也提供一部分经费。外务次官都筑于 1899年 1月 10日给加藤领事的一份机密信中披露了这一点。信中说：“由于贵官与成田安辉一道赴成都及打箭炉（今四川康定）旅行，向参谋本部申请经费 150元一事，从本部接到了通知。”从这一史料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为了赴成都、打箭炉“旅行”，成田向参谋本部提出了申请，参谋本部则通过外务省向他提供了所需旅费（另有不少资料均证明这一点，因篇幅关系，这里

恕不一一举引)。1901年 5月 30日成田给外务大臣加藤高明的一封信中也提到他的入藏计划得到了“大隈 (重信)、桦山 (资纪)、西 (德二郎)、小村 (寿太郎)、福岛 (安正)诸君的赞成”。这里的“福岛”即在陆军参谋本部专门负责中国方面情报事务的福岛安正⑧。另外，外务省也把成田入藏时的一些报告和文件转到参谋本部，甚至直接报告给参谋总长。这说明成田安辉的入藏计划也得到了日本军方的支持，其入藏情报为日本外务省和陆军参谋本部所共享。

三、成田安辉入藏前在重庆、成都、打箭炉等地的调查活动

据《成都及打箭炉旅行经历书》记载，1899年 3月 1日，成田与加藤领事一起从重庆出发，3月 10抵达成都，滞留 9天。3月 19日从成都出发，于 4月 2日抵达打箭炉，滞留 6天。4月 9日从打箭炉踏上归途，4月 25日返抵重庆。⑨整个往返旅程达 56天，花去旅费 238元。

在成都、打箭炉一带进行调查期间，成田广泛地与地方政要交往，对自己的入藏活动也毫不隐讳，甚至给四川总督进言，贡献施政方略。比如成田安辉滞留成都时，于 3月 16日给四川总督奎俊提交了开发四川的九条具体措施，其中第九条是“经营西藏要略”，提出西藏是四川屏藩，中国已拥有统辖权。为了维系该权利，需要对西藏进行开发。⑩

4月 2日成田安辉抵达打箭炉后，拜见了打箭炉军民府厅长刘仁齐。在成田的印象中，刘仁齐 (湖南人) 是一个“既不知中国在亚洲之何处，又不知东亚为何意”的 61岁老翁。成田要求他对自己的入藏活动进行协助时，刘氏以外国人很难进入西藏等理由推诿，而建议他先在当地寺院装扮成喇嘛学习藏语，再图进藏；或者是从巴塘南下到云贵地区游历，待到英国在西藏修通铁路以后进入西藏，这样会比较容易等等。成田听了刘氏的一番话后，非常失望，意识到了实现自己目的的艰巨性。临别时，他给刘氏呈送了自己的几首汉文诗和一篇题为《大东和邦论》的文章。

4月 5日，刘仁齐到成田的住所进行了回访，成田再次提出自己的入藏愿望。这次刘氏的态度好像有所转变，刘氏提议，为了安全起见，最好还是在当地入寺为僧，学习藏语，然后再计入藏。刘氏答应可以给他介绍当地喇嘛寺的住持，以后进藏时可以提供一、二名士兵护送到拉萨。刘氏还许诺，成田入藏后，通过打箭炉军粮厅给他送递书信和钱物。⑪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成田安辉计划进入西藏的同时，日本京都东本愿寺派遣的能海宽和寺本婉雅两位僧人企图从四川进入西藏，于 1899年 8月抵达四川巴塘，但在当地藏族人民的抵制下，其入藏计划遭到失败。不久，寺本婉雅返回日本，能海宽则试图选择其他道路进藏，但均遭失败。⑫成田安辉看到两位同胞的遭遇后，也意识到自己入藏计划的艰巨性，处心积虑寻找新的入藏方法。作为入藏的良策，他企图在清政府官员的保护下进入西藏，甚至梦想抵达拉萨以后住进驻藏大臣衙门，并得到驻藏大臣的保护。为此，1900年 1月 6日，成田安辉写信给日本驻华特命全权公使西德二郎 (1899. 11. 26—1901. 1. 3在任)，要求他亲自出面与清朝总理衙门交涉。他在信中说：“应该充分利用现在非常亲密的日清两国关系。为了防止消息外漏，希望公使以口头方式和总理衙门交涉，介绍我年内到西藏从事文物方面的调查研究，并在当地游历。另外，本人熟悉四川方言，容貌、服饰也与中国人无异。为了安全起见，希望得到以中国人的身份，与今春赴藏之中国官吏同行入藏的许可。”⑬然而，西德二郎公使好像没有满足成田的愿望，我们没有发现西德公使就此事给成田的回信，这一点从成田以后的活动中也可看得出来。

四、成田安辉与驻藏大臣之间的接触

成田安辉在重庆居住了两年多以后，总结出了三种入藏方法。上策是得到中国官吏或是著名大喇嘛的许可后，公然以日本人的身份进入西藏。利用这种方法入藏，可以在西藏进行

公开活动，传达日本的“好意”。中策是希望得到有关人员的默许进入西藏，但是利用这种方法入藏后，难于得到与达赖喇嘛或其他重要人物接触的机会。下策是化装成中国人秘密入藏。但利用这种方法，不可能在西藏公开从事活动，一旦自己日本人的身份暴露，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麻烦。因此，作为入藏之良策，首先应该采取上策。当然，成田安辉首先选择的是上策，为此他曾请求驻京公使西德二郎与总理衙门交涉，希望得到与驻藏大臣同行入藏的许可，但是未得到答复。当时成田已经获悉新任驻藏大臣庆善准备从四川进入西藏的消息，于是他决定亲自与庆善直接交涉，让庆善转交本愿寺法主给达赖喇嘛的礼物，并尽力和庆善一同入藏；如果他的要求被拒绝的话，准备化装成中国人，冒险入藏。

1900年 6月 22日，成田安辉从重庆踏上了入藏旅途，7月 2日抵达成都。7月 8日他托人给庆善府上带去重庆道台的介绍信及自己的一封求见信，并付上四川总督以前写给自己的一副书法。庆善遣使答应次日可以会晤。

9日上午成田到庆善的寓所拜见。成田说庆善“年逾古稀，但老当益壮”。谈话间，成田表示了自己与庆善一同入藏的愿望，说：“为了不引人注目，我扮成了中国人，此前曾在重庆游历两年，通中国语言文字，相貌与中国人无异。另外从重庆出发时也未让外国人知道。来到成都以后尚未与其他人会面。如果允准随同入藏，不胜感谢。”成田安辉虽然在庆善面前巧舌如簧，但庆善仍对他抱有戒心，甚至把他怀疑成替英国从事情报活动的特务，最后婉言拒绝了他的请求，说：“现在贵国与英国结成了亲交关系，英国一直从印度觊觎西藏，屡次派人打探西藏的情况。现在不能不怀疑英国委托贵国搜集西藏方面的情报，而贵国政府派遣您从事这项工作。”“西藏一直是禁止外国人进入的地方，如果我赴任之际随带外国人入藏，肯定会在西藏引起轩然大波，不仅失信于达赖喇嘛，而且也丧失了自己的职责。所以，我到任以后，与副大臣以及达赖喇嘛商量后，到明年三月以前给你回信。”[14]由此看来，庆善对成田不失警惕而且处理方式尚算明智。

1900年 7月 17日，新任驻藏大臣庆善从成都踏上了赴藏之途。19日，成田安辉派人给打箭炉军粮府刘仁齐送去日本造五连发手枪一支、子弹二百发，并附上一封所谓的“商定书”，让他转交给途经打箭炉的驻藏大臣庆善。所谓的“商定书”只不过是成田安辉的一相情愿，从这封商定中可以看出成田安辉的无理要求，具体内容如下：

就成田安辉安全地在西藏旅行、居住一事，成田安辉与庆善驻藏大臣做如下商定：

1、明年 3月以前，就成田安辉是否可以进藏一事，通过驻重庆日本领事馆告知成田安辉。如果准许入藏，就入藏之后的事情做如下商定；2、在驻藏大臣的保护、监督之下居住在拉萨；3、根据情况，可以居住在驻藏大臣衙门内；4、可以与大臣派遣的人一起进出；5、可以借用官府的仆人；6、可以用汉文撰写旅行日记，根据要求可以阅览；7、不得无故从西藏驱出；8、大臣请求达赖喇嘛给我推荐教师，研习西藏语言文字；9、委托官府送递书信；10、可以委托邮寄钱物；11、两者之间若有怀疑，可以面议解决，不得听信他言，轻易做出判断；12、若证实有不正当行为，可以接受适当惩罚；13、此商定不得任意更改；14、此商定在盖印后半年或一年以后，根据双方同意，商量变更之事。[15]

尽管成田安辉在驻藏大臣庆善身上费尽了苦心，但他的各种努力最后都化为泡影。这是因为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月）庆善在赴任途中死于巴塘，裕钢补替担任驻藏大臣，原四川候补道安成出任帮办大臣。

从成田安辉到四川两年多来的活动看，不能否认他出色的能力，在短短的两年内，他不仅掌握了包括四川方言在内的汉语，能用汉文写出相当出色的文章，而且在分析时事等方面不乏敏锐的观察力。但他缺乏做一名称职间谍的素质，这一点主要表现在他强烈的表现欲望，爱出风头，喜论时政，交游广泛，花钱阔绰，本应保密的入藏计划几乎无人不晓。他的这种作风以后招来了日本领事官员的指责，对其实现入藏计划表示怀疑。

在重庆期间，成田安辉曾化名为“陈良玉”。他在东川书院修学结束以后，因日本驻

重庆领事馆缺少翻译，曾移居领事馆兼做英语翻译的工作。此间，他在馆内开设了学馆，招收学生，教授英语和日语，交游广泛。由于他曾在美国生活多年，无疑对西方也有较深的了解，因此与重庆的欧美人也多有接触。虽然，成田曾指责企图入藏的日僧能海宽、寺本婉雅的语言能力，但我们没有发现他像能海、寺本那样学习藏语的迹象。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以后，由于担心排外浪潮波及到四川，当时驻在重庆的外国领事馆及外国侨民纷纷东撤，日本驻重庆领事馆于 8月 8日撤至杭州，成田安辉亦受令于 10月 14日经由重庆撤到杭州。不久，为了隐蔽起见，成田转移到了上海附近的农村，致力于从汉文以及西文书刊中搜集有关西藏方面的资料。

五、成田安辉从印度潜入西藏及在拉萨的活动

成田安辉转移到上海不久，鉴于从四川入藏的艰巨性，他计划改道经由印度入藏，并将此打算电告知外务大臣加藤高明（1900.10.1—1901.6.2在任），云“明年三月，喜马拉雅山的道路开通以后，从印度进藏”，同时要求增加入藏经费。[16]

在上海期间，正准备从印度进藏的成田安辉，于 1901年 2月，在上海耶酥基督青年会举办的一次活动中，结识了刚从西藏归来的原中、印勘界委员会翻译沈锡侯[17]。沈氏对成田安辉“西藏有落入英、俄之险，为了防止这种危险，必须要开发西藏，强化中国西部边境”等主张产生了共鸣。成田向沈锡侯还详细询问了有关西藏的内政、与外国的关系、气候、风俗、人情、物产、贸易、农工商业、宗教、交通运输等情况，并把他了解到的这些情况分两次报告给了外务省，题为《西藏事情概略》。成田认为上海的沈锡侯要比他在成都找的向导更理想。于是成田要求与沈锡侯一同入藏。沈锡侯答应了成田的要求，但是作为条件，要求成田提供五千美元的商业资本，还协议成田除支付沈锡侯的旅费外（预定 6个月），答应给沈氏家属每月补助四十银元。

成田安辉为了满足沈锡侯的条件，实现以中国商人身份进入西藏的目的，向外务大臣提出申请，要求外务省垫助五千美金。但是外务省拒绝了他的要求，只是同意付给他进藏补助金一千日元，言外之意就是如果用这一千日元还不能入藏的话，可以终止入藏探险计划。成田安辉在失望之余，不无愤慨和讽刺地给外务大臣说：“对于外务省的答复感激涕零”。[18]随之成田又通过驻北京公使馆，向日本驻北京派遣军司令官福岛安正求援，希望从义和团事件的收容金中给予筹措，同样未能如愿。于是成田安辉转而向寻求英、美的资助。其实，成田安辉没有把握得到外国的经济援助，他只不过是对外务省的冷淡态度表示威慑或不满而已。对于成田申请外援一事，没有发现外务省方面的任何答复，最后可能是不了了之。从这里也可发现，成田安辉与外务省之间关于入藏经费问题赤裸裸地讨价还价之景象。

虽然寻求五千美元资助的希望落空，但成田安辉最终还是踏上了赴藏之途。1901年 9月 21日，成田安辉、沈锡侯以及一名在西藏生长的四川籍随从一行三人从上海出发。临行前，成田安辉将此前一直使用的“陈良玉”一名改成“成辉”。他们计划如果途中一切顺利的话，大约 68天后到达目的地——拉萨，在那里停留一个月，翌年 2、3月左右返回上海。他们从上海先乘船到香港，再从香港抵达加尔各答，后经锡金北部入藏。他们所走的是一般的路线，即从江孜经浪卡子进入拉萨。

到了藏印商务口岸亚东以后，成田安辉遇到了他未曾预料到的事情，此即原商定与他一起去拉萨的沈锡侯留在了这里，出任亚东海关官员。这无疑给成田安辉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无奈之下他说：“锡侯生长在上海安逸的环境里，对他缺乏仗义不值得责备”，“我很早就看破了他的软弱，现在即使让他改变主意也毫无益处，对他的行为也只有莞尔一笑，对他得到一个舒服、高薪职位表示祝贺。”[19]沈锡侯尽管没有履行诺言，但他还是给自己在拉萨的旧知写了介绍信，要求对成田安辉进行关照。

在通过印藏边界时，成田作为沈锡侯的“同乡商人”，没有引起任何怀疑。但是，由于途中成田安辉不时地绘制地图、拍照、做笔

记，这引起了在大吉岭雇佣的一名藏族随从的怀疑，以致他不敢公开记笔记。[20]到了拉萨以后，成田安辉便解雇了这位随从。

据《进藏日志》记载，成田经亚东、帕里、江孜，1901年12月8日到达拉萨。这比他原来的计划晚了11天，即从上海到拉萨用了79天。他先是拿着沈锡侯的介绍信及礼物拜访了前藏知府何光燮，随后又访问了候补知事李佶臣。由于李洁臣是成田安辉在上海时的旧知，知道成田安辉的身份，因此，成田叮嘱李佶臣不要给别人透露他的身份。

12月11日，成田安辉带着沈锡侯的介绍信和礼物拜访了驻藏大臣衙门秘书何锟。何锟对他在拉萨的活动提供了不少方便，成田安辉在其日志中写到："在我访问后的第二天早晨，何君来访，此后他几乎每天过来寒暄。介绍达赖喇嘛的翻译官罗藏半，准许参观达赖喇嘛宫殿的会客室，介绍给达赖喇嘛的宰相总堪布，在陪同参观大召寺以及归程准备等方面给予了很多帮助。"[21]

成田安辉在何锟的陪同下，访问了达赖的翻译罗藏半，向他提出了想谒见达赖以及给达赖敬献礼物的愿望，罗藏半答应12月18日在布达拉宫给予谒见达赖的机会。成田安辉准备赠送给达赖的礼物是两箱（疑为两串之误）日本产水晶念珠和两卷中国内地制黄绢。

可是准备约见的当日，何锟过来说："达赖喇嘛眼下正在闭关坐静，此间即便是驻藏大臣也难于会晤。因此给你介绍会晤势力仅次于达赖喇嘛的宰相堪布。会见此人比会见达赖喇嘛更难，幸运的是在他身居要职以前与自己相识，能给予会谈的机会。"[22]这里的宰相堪布即布达拉宫的堪布喇嘛堪仲钦巴，他是西藏地方政府噶厦的四名噶伦之一的僧职噶伦，主要管理达赖身边的事务以及布达拉宫的财政事务，并通过译仓（yik—tsang）掌管西藏全土的寺院行政事务。由于成田安辉的《进藏日志》只是写到会见堪仲钦巴以前参观大召寺的活动情况，因此，成田安辉与堪仲钦巴会谈的详情不得而知。但是，从《进藏日志》中的一些记录也不难想象他们会谈的主题。成田在其《进藏日志》中说"终于快要安全进入拉萨了，应该能得到给当局者吐露胸襟的好机会"、"计划传达我国的好意"[23]。因此，以前他曾多次强调的"西藏有被英俄瓜分的危险"、"在西藏实行文明教育，建设铁路、公路，从国外聘请武官训练藏军，振兴农工商各种产业"及"大东和邦论"等等都可能是他所谈论的主要内容。然而，他以一介内地汉族商人的身份，对初次见面的总堪布不可能真正传达"日本的好意"，否则就会暴露出日本人的身份。[24]

成田安辉似乎也作好了其身份被暴露的准备。他给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的一封信中说："正如阁下所知道的那样，安辉进入拉萨与普通的探险者不同，不只是为了学术探险和宗教研究，而是另有他意。因此，一旦发觉我的身份，我可以转祸为福，吐露赤心。当然，让他们发觉不是我所希望的。但是一旦事发，我可以迅速给西藏传达我国的好意……"[25]

成田安辉入藏时本来带着一架柯达袖珍相机，曾将入藏途中的风光有所记录。[26]但在进入拉萨的前一天，马夫将相机丢失，使成田懊恼不已。另外，成田在入藏途中，除写日记外，还对当时的相关人物、西藏风俗等情况以绘画的形式做了记录，惟妙惟肖，还留下了两幅西藏地图。进入拉萨以后，为了开拓与西藏之间的通商贸易，他对当时拉萨地区的商业贸易状况进行了仔细地观察，这方面的记载占去了其《进藏日志》的很大篇幅。这也给我们研究20世纪初期西藏历史、经济、文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成田安辉耗时四年、费尽周折进入拉萨以后仅停留了18天。至于停留时间很短的原因，除经费问题外，想必另有原因。担心身份被暴露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因为有人知道成田安辉的身份，如上面提到的李洁臣。为了明哲保身，很有可能催促成田安辉尽早离开拉萨。于是，于12月25日成田安辉匆匆踏上了归程，于1902年4月19日返回上海。关于返程情况，没有留下任何记载。5月5日，成田安辉收到了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的归国命令，遂由上海返回日本，其特殊的西藏探险计划宣告结束。

成田安辉返回日本后，很快向外务省提出了再次进藏的申请，但未能如愿。此后直到

1904年初，他主要从事从中、西文报刊上搜集相关西藏方面的情报，以及撰写相关西藏问题的评论报道，并且一直与外务大臣小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此间他向外务省提交了《关于西藏的将来》、《关于西藏的时局》、《印度至西藏的道路状况以及关于英藏纷扰之私见》等重要报告。在这些报告中他主张日本眼下应支持清朝领有并开发西藏，不能把西藏拱手让给英、俄等国，或者是让清朝给所有国家开放西藏、利益均沾等言论。

1904年 2月，日俄战争爆发后，成田安辉受日本陆军省和外务省之命，返回中国，参加了在俄后方从事破坏铁路及搜集情报等活动的特务班。从此，他未再与西藏发生什么联系，也没有发表他的西藏旅行日记，因为他是以内地汉族商人的身份进入西藏的，如果将自己的入藏活动公布于众的话，不仅要殃及给他提供了帮助的人的安全，同时他肩负的“特殊使命”也会公开于天下，这不是他或日本政府所希望的。1915年 7月，成田安辉在奉天（今辽宁沈阳）病死，享年 51岁。㉗

---

①（日）成田安辉《进藏日志》（上、下），载日本山岳协会杂志《山岳》，1970年 12月，第 65号，第 1—56页；1971年 12月，第 66号，第 1—37页。

②（日）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档案：《成田安辉西藏探险关系一件》（1897年 2月至 1905年 8月）一册，编号为 1门 6类 1项 11号（简略为 1. 6. 1. 11)。该件档案以年代顺序编排，无页码表示。本文中的资料除注明的外，均引自该档案，特此说明。

③（日）对支功劳者传记编辑会编《对支回顾录》(下卷、列传)，1936年，第 773页；成田安辉《进藏日志》(上)，《山岳》第 65号，第 55页。

④（日）成田安辉《关于西藏开放的必要性》。

⑤（日）成田安辉《成田安辉可否滞留中国问电》。

⑥（日）成田安辉《给达赖喇嘛及其他人礼品的请求件》。

⑦（日）成田安辉《给达赖喇嘛追加礼品的请求件》。

⑧福岛安正（1852—1919)，日本明治时期陆军军人。1874年从司法省进入陆军省，被派遣到中国、朝鲜、印度收集情报。1883年 6月至 1884年 11月任驻中国公使馆武官。后任参谋本部编纂科长、第二部部长(情报部)，专门负责收集中国方面的情报。1908年任参谋次长，1912年任“关东州”都督，1914年升为大将。

⑨（日）山口瑞风《西藏》（上，东京大学出版会，1987年）第 79页，将成田氏返回重庆的时间记为“5月 10日”，误。

⑩（日）成田安辉《在成都给奎总督上书件》。

⑪（日）成田安辉《在打箭炉与刘厅长的会晤情况件》。

⑫关于这两名日僧的入藏活动，参见（日）能海宽《能海宽遗稿》，东京，五月书房，1998年；（日）寺本婉雅《蒙藏旅日记》，东京，芙蓉书房，1974年。

⑬《关于进藏一事与总理衙门交涉件》。

⑭1900年 10月 30日成田安辉给外务大臣加藤高明的报告。

⑮成田安辉《第九号商定信》。

⑯1900年 12月 15日成田给加藤高明的信。

⑰沈锡侯（1873—？），字晋熙，上海人，毕业于上海的教会学校，精通英文，青年时曾游历南洋诸国。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受驻藏大臣文海之托，担任中、印勘界委员会翻译，在西藏居留了三年。

⑱（日）成田安辉《关于申请入藏外资补助的报告》。

⑲⑳㉗（日）成田安辉《进藏日志》上，《山岳》第 65号，第 21—22页；第 32页；第 56页。

㉑㉒㉓（日）成田安辉《进藏日志》下，《山岳》第 66号，第 33页；第 33—34页；第 21页。

㉔山口瑞风对成田安辉会见堪仲钦巴一事表示怀疑，认为如果真有其事，成田无疑会大书特书。见山口瑞风《西藏》(上)，东京大学出版会，1987年，第 80页。

㉕1903年 2月 5日成田安辉给小村寿太郎的信。

㉖其中的部分照片，日本地理学家小川琢治以《成田安辉拉萨旅行》为题，在 1904年日本《地学杂志》183—186号、191—192号上分别给予刊登和介绍。